

中国城市风险化：空间与治理^{*}

陈进华

摘 要：城市风险化作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对快速城市化进程可能给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现实或潜在风险的结构特征与内在发展机理的反映和反思。城市风险治理业已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共识性议题。基于“空间理论”检视，中国城市风险化实质是普惠型的城市空间权益体系尚未构建成熟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城市空间发展、调整和修复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均衡导致空间结构失衡、功能紊乱及其生态失序。“空间治理”作为一种由役物至化人的现代化城市公共治理的创新形态，旨在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市民等不同主体在空间生产及其权益分配层面上诉求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生态优化的“空间利益共同体”，创新城市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动力、机制及其文化生态，以求实现城市空间治理的制度化、复合化及其有序化，战略性地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达致风险时代城市空间配置、增长及其修复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空间治理愿景。

关键词：城市风险化 空间生产 公共治理 空间治理

作者陈进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州 215123）。

城市风险化，是在工业现代性逐渐被城市现代性所置换、吸纳、溶解中转换而来的一种新的社会风险即“城市型风险”。缘于传统的“乡土中国”逐渐被“城市中国”所置换的中国发展进程，“城市风险化”业已成为学界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共识性议题。譬如，有用“耗散结构理论”，对城市风险问题的形成和演化机理进行建模分析；^① 有用“韧性理论”，对城市风险治理及指标进行建构；^② 有引“沟通理论”，

^{*} 本文是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研究”（2015ZDIXM03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2015ZSTD010）的研究成果，受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政治学、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

^① 王光辉、刘怡君、王红兵：《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城市风险形成及演化机理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1期。

^② 周丽敏：《韧性城市：风险治理及指标建构——兼论国际案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试图通过风险沟通制度的重构来提升保障城市风险治理能力；^①也有学者借助“周期理论”，探讨现实维度中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生成机制与系统治理。^② 综上研究多为先按照某种逻辑将城市化风险进行理想归类，再针对不同类别的风险提出理论解读或应对措施的基本思路，颇具远见和实践意义。事实上，现代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任何企图使用一种分析工具的线性思维，去机械拆解城市型风险问题难免徒劳或炒作喧嚣于一时。因为任何单一的分析框架一般都会将“城市风险化”问题置于静态的分类处理系统中，而伴随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不同类型的城市风险呈现出相互纠缠、彼此交叠复合的系统性风险。例如，交通拥挤所导致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市民生命安全，还会对一个或多个城市的市民获得感、企业家精神和政府行政造成影响，进而引发企业撤资、人才逃逸和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城市型风险。本文试图建立一种以“空间与治理”的复合视域来建构分析城市化的风险逻辑、风险本质、风险治理问题的学理基点，以求规避通过理想归类来机械拆解城市风险化类型的线性思维，从而动态分析和立体检视相互纠缠、彼此交叠的高度复合性和不确定性的城市风险化的基础理论及其治理创新方向，进而推进中国城乡发展的“空间复兴”。

一、城市风险化的空间理论检视

城市风险化作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对快速城市化进程可能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现实或潜在风险的结构特征和内在发展机理的反映和反思。城市风险治理已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共识性议题。以“空间理论”检视，城市风险化的实质是普惠型的城市空间权益体系尚未构建成熟所引发的社会综合性问题；城市风险化的主要症结表现为城市空间发展、调整和修复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均衡导致空间结构失衡、功能紊乱及其生态失序；城市风险化的滋生缘由关乎城市空间“何以配置”、“如何配置”、“谁来配置”，即城市“空间生产方”与“空间消费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力量较量的基本问题。

以空间理论检视城市风险化问题，源于城市化与城市风险化的双重理据。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与城市人口流动性增强引发的时空结构变化，使人们经由空间交往而带来的获得感远多于时间延续的累积。“空间”以前所未有的流动、变化、加速和融合的方式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建构性力量，为空间理论检视城市风险化问题夯实了实践基础。另一方面，伴随城市规模扩大与城市人口流动性的

2016 年第 2 期。

① 詹承豫、宣言：《城市风险治理中的风险沟通制度——基于 30 部法律规范的文本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② 李友梅：《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3 期。

不断增加，因城市空间结构失衡、功能混乱、公平赤字、治理困境等问题带来的交通运输、能源供应、食品供应、医疗卫生、信息和通信等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社会系统风险，以问题倒逼机制催生出以空间理论化解城市风险化问题的现实逻辑。城市化过程既是市民权利空间拓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潜藏着市民空间权利冲突的社会风险过程。“城市风险化”作为一种反映、概括和表述城市发展进程中社会风险不断集聚的存在论的哲学范畴，“人—空间—治理”及其复杂关系构成“城市风险化”基本影响因子。主体层面的城市风险化，旨在省视和寻求何以、又将如何“让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意义问题；空间层面的城市风险化，重在审视和诠释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交织下的城市空间异化问题；而治理层面的城市风险化，侧重考量一定社会转型加剧与社会规范相对滞后之间的“张力”诱发的社会系统性的城市风险问题。

（一）作为一种空间权益配置的城市风险化

城市是一个集地理、经济、政治、社会及其文化的空间地域实体。城市化本质上是人及其附属物在空间结构、功能、生态系统内重新集聚和型塑的过程。在以土地、资源、人口为基本元素和以学习、工作、生活为基本状态的动态变迁轨迹上带来了新的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文化心理空间和人际交往空间。中国城镇化进程就集中表现为农村社会在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文化心理以及交往空间上的重组和转型。空间密度的复合型提升，以及因空间密度而激发学习、分工、收入、生活便利度提升的城市化效应构建了“人口城市化”之核，而决定空间密度背后的实质则是城市空间权益配置正当与否、市民空间权益表达机制平等与否的社会正义问题。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城郊结合部少数弱势群体的居住隔离与聚居、城市中反社会行为的空间分布等问题，都是缘于城市空间权益或权利多元主体博弈的重组过程和多重形态。

以“空间权益配置”来审视，城市风险化的实质是普惠型的城市权益体系尚未构建成熟或完善所引发的社会综合性问题。^① 空间结构失衡、空间功能紊乱、空间生态失序构成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风险化的主要症结。在以汽车为尺度、车行为主体的环路建设，和以封闭为主的人居小区的广泛复制中，市民的就业、居住、购物、上学、就医等“一揽子”日常生活“在宽马路、大路网”中的系统运行不堪重负。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人的本性是亲近自然，而以封闭为主的人居小区，则隔阂了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减少了市民户外运动的的活动空间，进而使老人、儿童群体容易发生抑郁、焦虑、缺乏意义感和好奇心等症状。所谓停车难、买菜难、就医

^① 胡小武：《新常态下的城市风险规避与治理范式变革》，《上海城市管理》2015年第4期。

难、就业难、小区儿童上幼儿园难、老年人缺乏活动室、公共卫生间难寻觅等影响市民生活质量和制约城市发展的“城市病”，皆源于市民权益分配及其表达机制不平衡导致的城市不同群体的“空间焦虑”。人是城市的主体，空间是城市的载体与容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取享有城市空间的平等权利过上美好的生活，城市空间也不会天然地成为所有人过上美好生活的平等的公共资源。城市空间“配置什么”、“如何配置”、“谁来配置”既是关涉“谁是城市主人”的基本问题，也是滋生城市风险化的基本问题。

基于“空间权益配置”的审视，我们可以对城市风险化的主要症结作如下解读：其一，因城市化和工业化后果所致的城市风险。城市作为人类财富和科技成果的创造地和贮存池，足以让所有充满梦想的人向往之，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渠道涌向同一个空间城市，进而导致空间的挤压、无序及其功能混乱。其二，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化引发了城市风险化。目前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城市风险化的严重性分析深刻，但对由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城市风险化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可治理性剖析不足。作为一种基础性变量，社会结构变化是引发当代中国城市风险化的关键要素。快速的城市化带来城市社区的解构、市民阶层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稀释等加剧了城市风险。其三，以城市规划为主线的城镇化易于刺激并诱发诸多人造风险。城市规划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蓝图和依据，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诚如作家爱伦堡赞美法国巴黎所言：“巴黎不是按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往昔和现在融为一体，使它成为一座奇妙的城市。”^①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城市规划理念，都将加速城市风险化的烈度和浓度。诸如以狭义的美化、亮化为名的“城市美丽”规划理念，用辉煌的景观或广场拆掉和替代了一些承载着历史文化活力的旧城区；以搭建积木技法的“城市现实主义”规划理念，让拔地而起的一栋栋新楼硬生生地把内部开放的城市分割成一个个孤岛状的、碎片化的封闭单元，进而刺激并诱发出诸多“被城市化”的人造风险，即“城市大了，空间小了；道路宽了，交通堵了；人口多了，沟通少了；消费高了，生活难了”。其四，社会群体风险意识增强和自媒体传播方式放大了城市风险。社会群体风险意识的增强强化了人们的风险心理，基于认识模式和认知能力差异，这种风险心理极易放大大局部的、零散的城市风险。自媒体传播方式，一方面使传统的信息垄断和信息权威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在遭遇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捕风捉影、空穴来风便成为放大和扭曲城市风险的舆论场域。

在社会转型复杂大背景下的城市风险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关联性特征。

^① 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冯江南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126—127页。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在时空压缩的环境下展开，因此各种城市风险相互交织。当看似某一小的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危机爆发的关键节点，在社会心理以及社会传递的双重作用下，风险将会快速在一定范围内累积、碰撞，从而诱发整体性的社会风险。二是异质性特征。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为一体的多元异质性社会，作为一项复杂的公共选择的城市化，其带来的城市风险也复杂多样，其中包括结构性风险、价值性风险、功能性风险等。三是裂变性特征。城市既是文明的聚集地，又是一个风险高地。城市风险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影响下极易发生裂变、变异，容易衍生出更加难以治理的社会危机。四是非均衡性特征。^①城市化的受益群体与风险的承担群体往往有较大的差别，由于弱势群体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力量弱小，风险很有可能转嫁给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对于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量比较大，但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均以及自身能量有限，他们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机率却最低，最后成了弱势群体为既得利益集团买单，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怪圈。此外，由于城市风险影响的深远性，还极易转嫁给子孙后代。即既可能表现为由于资源紧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带来的“代际传递”，又可能由于弱势群体受到教育、社会交往、心理、价值观等因素的制约，造成下一代继续承继上一代的不平等，存在着“代际传递”效应。在此情势下，城市风险化就必须正面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城市代际政治正义”的问题。故此，创造条件塑造城市代际正义便成为城市善治的重要命题。

（二）城市风险化的空间表征、后果及肇因

城市风险化的空间表征、后果及其肇因皆滋生于城市“空间生产方”与“空间消费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力量较量的基本矛盾关系。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生产，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城市内部空间的更新，二是城市空间的外延扩张。前者是一个存量空间的优化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新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存量空间的优化与增量空间的合理安顿，是以经济使命为核心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谨慎解决好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其城市空间生产过程除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力，还会受到国际资本涌入所产生的集聚力量拉动。以通过空间生产获利的“空间生产方”，和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

^① 这种非均衡性包括城乡非均衡性以及城市内部的非均衡性。由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使城市结构发生剧烈重组。凭借金融体系的运转和资本的地缘性流通，城市空间格局发生由“行政中心/厂区/住宅区”到“金融中心/商业区/社区”的嬗变，同时因人口流动和城区扩建导致城乡关系日趋复杂化。因地缘性不均衡发展将在微观层面引发社会正义失范的一系列结果。（参见温权：《城市空间重构的微观正义隐忧》，《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居住条件的人民大众为代表构成“空间消费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呈现为强势的组织化力量与弱势的分散化群体之间的利益较量，少数人获利与多数人受损的社会格局，这可能引起以社会冲突为行为方式的群体性事件，从而在根本上牺牲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发展前途。具体而言，城市风险化的空间表征呈现如下。

第一，城市主体的空间摩擦。城市化的本质不仅发展生产力，也要调整生产关系，其过程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资源、人口、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加剧了城市主体空间摩擦的风险。一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候鸟式”的人口迁徙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量的劳动力之外，还由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社会习俗等之间的差距，给城市社会空间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二是在城市空间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征地拆迁所引发的利益冲突，给城市空间的稳定发展带来了风险。三是城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进的各类污染型企业在给城市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在戕害着城市空间的生态化运行，也引发了城市空间主体如企业、市民、媒体、政府等之间的多重博弈。

第二，城乡发展的空间阻断。城市化必然伴随经济的市场化，前者为后者提供空间，后者为前者凝聚动力，以此型塑城市空间拓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建立在资本和权力合谋基础上的城市化进程，受行政力量的干预和市场逻辑的支配，社会资源单向度的城市流向，城市不断把成本和风险转嫁农村、压榨农村，导致城乡发展结构的严重不均衡，潜伏着城乡发展空间断裂的社会风险。城乡发展的空间阻断具体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以及城里人与乡下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城市空间不断挤压中越来越远。

第三，城市结构的失衡。由于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在较短的时间维度进行的，整个城市空间结构尚未得到加固。城市结构失衡的风险主要缘于利己主义或政绩主义的理念，注重城市空间的平面形态、功能布局等物质形态的精致性，忽略了城市风貌特色、文化传承和生活品质的个性化。这种结构失衡风险在空间上表现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权利空间城镇化滞后于物理空间城镇化、城市空间生态急剧恶化以及产业发展滞后于人口增长与空间扩张。这与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仍行进在碎片化与利益化的轨道上不无关系。

城市空间的主体摩擦、发展阻断、结构失衡，导致了以“问题—危机—风险”的现实因果链展开的深层次的城市风险化后果。社会结构的持续转换与社会空间的深度重构，^①内生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孕育着一连串的社会危机，汇聚着一系列

① 格雷戈里就曾说过，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是相互依存的。离开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就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阐述，而离开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也不可能得到实践。（参见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8页）

的社会风险。第一，社会问题共生。城乡发展空间撕裂既造成“乡村空心化”、中小城市的“空城化”，也滋生了诸如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环境问题等大城市的“城市病”。而“多流汇聚”的城市，在集中发展资源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摩擦，诸如流动人口问题、户籍问题、社会冲突问题等，以及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第二，社会危机叠加。转型社会的城市治理，面对的不是一个或一种危机，而是彼此杂糅、相互嵌入的各种结构性和过程性风险。在价值层面，由于社会分化带来的价值冲突；在结构方面，由于权利贫困带来的阶层分化并加以固化；在社会治理层面，由于多元利益主体的制度化接纳和行为引导不力而导致纷繁复杂的权益冲突。第三，社会风险扩散。转型社会的城市风险化弥漫于价值性风险、主体性风险和工具性风险及其复杂关系之间。价值性风险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对城市空间的强势“殖民”背离了城市空间正义的发展方向，空间的过度开发致使城市空间发展背离了城市发展为人民服务的价值选择，譬如征地拆迁中对人民利益的损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主体性风险主要呈现为城市治理过程中可能上演城市政府“独角戏”，忽视城市居民的利益表达需求，影响市民作为城市主体的主体性地位。由城市治理机制、方法、路径不当引发的风险则为工具性风险，譬如狭隘的经济手段：过于重视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不断挑战环境的承载力与资源的可持续性；片面的行政手段：过多的行政干预致使权力行使失去约束，戕害城市的和谐发展；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化治理工具选择不足，缺乏有效应对网络时代下社会风险的预警机制。

综上所述，城市风险化是一个伴随城市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调适的过程中产生、演变、蔓延的社会结构性问题。需要从作为快速转型的社会结构系统性因素、心理因素、制度性因素中寻找和考量造成城市风险化的主因。

其一，城市风险化形成的系统性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与现代化有序转型任务的艰巨性，城市化进程势必以扬弃传统性与获得现代性来催化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作为中国的一项综合性过程，它不仅是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更是人为的、建构的一个过程，其中涉及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文化观念一系列的影响因素。作为一种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国的城市化将实现一种时空高度压缩下的现代性，这些急剧的现代性变化远远超过了现有社会系统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系统紊乱，产生了巨大社会风险。^①社会结构的“紧张”，便是一种城市风险化现象。换言之，城市风险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其内生的转型逻辑和发展序列导致的必然现象。譬如，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持续性转换、张力的拉大快于社会治理的规范重建，这种与社会结构变

① 李云新、杨磊：《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成因探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化伴生的系统性失衡，要达致新的社会平衡与社会有序化需要一个较长的阶段。当然，必须谨记的是，在一个经济发展作为最高议程的当下，相当速度的城市化是契合国家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具有其合理性和实践价值。但是如若放纵利益驱动与政绩压力去一味追求城市化的空间扩张，忽略了社会系统的演进规律与承载限度，势必加剧社会结构的失调与社会秩序的紊乱，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大幅增加。

其二，城市风险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因素。城市风险化作为一个社会综合性问题不仅受制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社会心理结构状态的影响。社会心理作为一种弥散在社会群体中的情绪基调、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构筑社会结构系统诸要素中最敏感的综合感应器。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风险化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紧张与制度失范，更是社会心理运作机制的一种负面的社会化投射。一方面，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乡村、流向城市，固有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不断消解，传统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规范也在发生断裂，他们新的社会规范与社会认同尚未建构，新市民陷入了迷失期。另一方面，在普惠型的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尚未得到完全确立以前，新移民尚难以与老市民一样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长此以往相对剥夺感会与日俱增，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种种价值观迷失和心理失衡成为城市风险化的直接诱因。

其三，城市风险化形成的制度性因素。有效的制度是阻断城市风险化的规范性力量，但是固化的制度却是生产城市风险的重要源头。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的城市化撬动了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但在实践机制上尚未打破已经被固化了的城乡利益格局。即便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和既有城乡分治制度规则的模糊，也只是给资本和权力的强势介入提供了政策性空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遗产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被政府和利益集团所固化。所谓农民工的“候鸟现象”便为一例。政府通过吸纳农民工进城为城市的发展甚至是国家发展提供人口红利，而户籍、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壁垒将广大农民工阻拦在城市之外。“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并存的尴尬，和城镇化“流”而不“通”，或者“通”而不“畅”的窘困，表明制度壁垒是城市风险化的主因。一方面，为了城市的扩张和发展将农村的土地资源兼并，另一方面，为降低城市发展的成本，把失地农民排除在城市社会公共保障体系之外，加之，常态化的利益诉求机制不畅与社会流动机制的阻断，使得已经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更加“贫困”。

二、城市风险化中的公共治理问题

以“公共治理”视角研判城市风险化问题，主要理据有二：一是空间结构失衡、功能紊乱及其生态失序，已然构成城市化发展中的公共治理瓶颈。二是城市空间发

展、调整和修复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均衡现象是现代城市发展必须面临的严峻的公共治理问题。科学研判主要由空间权益配置不公滋生的城市风险化中的公共治理问题，是治理城市风险的逻辑核心。一方面，城市化是社会结构发生变迁的表征现象，“城市中国”在置换“乡土中国”的过程中，伴随传统的乡村社会被解构、消解，以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聚集、放大、扩散、演变着诸多复杂的公共治理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市化作为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其动态调谐的空间治理机制略显粗糙或不足，难以化解社会结构转变带来的城市系统的空间压力，以及社会整个转型带来的固化、散逸、漂移等城市社会风险，呈现出社会矛盾与城市风险不断放大的面相，进而制造、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城市公共治理问题。

（一）城市空间及其公共治理逻辑

城市化作为一种空间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过程，是一种以空间的承载化为表征，以空间的社会化为内容，以权利的空间普惠化为内核，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意义铺展开来的综合过程。其间伴生由于社会结构张力所带来的空间冲突与空间风险，既暴露着城市空间治理体系的乏力与常规空间治理结构的失灵，又孕育着良善的城市公共治理逻辑及其体系结构。

在复杂现代性和快速城市化的语境下，新型城镇化作为一项综合的国家改革议程，涉及多个层面的空间重构。第一是物理空间重构，以产业聚集、资源整合、人口集中为主要方式，以“土地城镇化”为基本表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第二是社会空间重构，主要是实现民众权利的生长与政府权力的规约，运行的是民众的发展保障和公共权益的均等化，实现的基础是人的权利的现代化，形成了以保障公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公民政治。第三是心理空间重构，其关注的核心在于国家认同和身份的确认，运行的核心是秩序、效率和公平，实现的是人的精神价值的回归。

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权利属性及其互为关系，是实现城市空间公共治理的逻辑起点。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具有社会属性。^① 空间并非是物理意义上的自然空间，也不是几何层面的抽象空间，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和内涵的社会空间，即以广泛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空间化和秩序空间化，城市的空间生产是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空间演化过程。一个城市的空间生产，既是构筑市民创新生产、生活方式的场所，又是型塑市民享受权利和实现希望的新型社会关系。城市空间作为市民生活的集聚、排斥甚至冲突的“发生器”，具有典型的社会资本属性、文化符号价值及其社会关系特征。城市空间生产让城市空间从静止走向流动。具体而言，城

^① 李春敏：《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市空间通过社会建设的共建共享，实现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公正、公平的社会福利，阻断原有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空间隔离与空间不平等。

城市空间的权利属性，其实质就是城市空间的正义性。城市空间的权利属性，具有多重维度的不同内涵：其一，城市空间技术—经济权利属性。技术—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发展功能是现代社会城市空间的首要功能。当然，一味地强调城市发展经济的功能，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后果。其二，城市空间的社会—政治权利属性。城市物理空间权利化的过程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而这种空间社会化与社会空间化的双重建构，具有显著的社会政治性。^①作为空间变迁与空间调整的城市化，既是“空间生产方”主导资本与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实现“空间消费方”权益再生产的制度选择。其三，城市空间的文化—生活权利属性。文化是城市的生命，是城市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文化在城市空间内产生，又形塑着城市空间；发展独特的城市文化是城市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务。其四，城市空间的自然—环境权利属性。城市的生态权益发展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越来越会成为一种最基本的需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自然环境恶化日益严重，在严重影响人们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在威胁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大众手中的“城市权利”。

城市空间的社会化与空间权利的普惠化构筑和规范了城市的公共治理逻辑。其一，建构一种以城市空间化为主导的公共治理体系。更新公共治理理念，以实现政府、企业、社会、市民的多元互动达致共赢的善治状态；强化公共治理民主化、公平化的价值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内涵呼吁城市空间正义转向，^②以空间正义的价值和目标对资本和权力加以规范和引导；推进公共治理方式方法的效能化。坚持行政手段、市场化手段、工商管理及其社会自主的互为效用，实现城市空间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治理体系的完善。

其二，优化以城市风险化为问题导向的公共治理结构。针对社会利益严重分化的城市风险化，城市化战略的推进需要建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双重维度的空间治理结构。良好的空间治理结构需要把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主体融入到具有不同功能的社会组织中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形成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效统一。有序化和制度化的利益整合将会形成对空间展开有效公共治理的能量来源，也是化解城市风险化的有效手段。城市化是新一轮的空间扩张与资源

① 胡潇：《空间的社会逻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② 实际上，在哈维那里，他不用“空间正义”这个概念，而是使用“地域正义”（territorial justice），指向绝对空间的正义。参见戴维·哈维、汪民安、赵勇：《城市空间、资本运作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学术研究》2016 年第 10 期。

重配的过程，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化、资本与权力的支配逻辑呈现出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因此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是激发城市空间发展的活力所在。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必将是提供有效的、多样化的、公平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的治理结构，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夯实国家的治理基础。城市空间由于权力和资本的强势植入，贻害了城市的空间正义转向，因此需要强化公共治理结构的社会服务功能。城市风险化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和社会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监管失序。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在实现市场和社会不断走向开放和平等的同时，也要强化其对政治主体、社会主体、经济主体的监管功能，实现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

（二）当代中国城市风险化中的公共治理问题

城市风险化概念本身既内蕴着对传统城市治理的反思，更批判性地审视当下城市公共治理的实践过程。当代中国城市风险化中的公共治理问题，既有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时代性把握问题，也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批判问题；既有现实语境和城市空间的公共治理问题，也有当下中国城市风险化日益多元复杂的新型现实问题。

第一，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中的科学性问题。快速城镇化驱动下，以“过渡型社区”为版图的城市空间扩张，固化为城市空间风险化的问题聚集地，加大了城市空间治理的难度。市场化背景下的人口快速大规模流动，致使越来越多传统的“单位人”为“原子人”所置换。缺少“单位人”集体表达共同需求机制的“原子人”们的利益诉求、权益表达及其不满情绪，很可能经由不经意的导火线引起群体性事件，造成破坏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

第二，风险社会视角下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由于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治理缺乏必备的配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加之转型国家的政府行政执行能力内卷化严重，造成制约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作为城市治理核心行动者的城市政府，既受制于其决策的价值偏好又受限于实际的财政资源，造成诸如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权利均等化相对滞后于城市人本化发展的需求，尤其是稀缺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分布失衡格局，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业已形成严重桎梏。

第三，转型社会下中国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性问题。转型社会意味着社会利益的结构调整，不管是通过增量的做大还是存量的分配，城市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便是解决城市空间风险的钥匙。在新城扩张和旧城改造的过程中，面临新一轮城市发展红利的分配过程中，如何处理新老市民的心理落差，重新建立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是城市旧城改造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重构新老市民的城市主人翁意识，以宽容心态接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外来事务”是城市空间治理中的重要

课题。

当代中国城市风险化中的公共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由于资本逻辑驱动下的空间生产所导致效率与公平深度失衡，导致治理体系在短时间内难以有效应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张力问题。不管是城市的科学管理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是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性问题，都因资本逻辑的过度侵蚀而损害了城市人本空间的营造。要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就必须实现资本的空间正义转向。^① 以空间正义的价值目标和原则对资本加以规范和引导，克服其贪婪本性，促进城市空间生产更加合理有序。^②

三、空间治理：风险时代城市公共治理创新

“空间治理”作为一种由役物至化人的城市公共治理的创新形态，旨在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市民等不同主体在空间生产及其权益分配层面上诉求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生态优化的“空间利益共同体”，创新城市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动力、机制及其文化生态，以求战略性地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达致风险时代城市空间增长与空间修复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空间治理愿景。

（一）由役物至化人的空间治理主题

与以往传统的城镇化所不同，新型城镇化是从以物的城镇化为主线的空间发展转变成为以人的城镇化为旨趣的空间人本化。^③ 即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生产、空间治理应该实现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人的权利的生产、再生产为主要依归的新型城镇化空间范式。

首先，实现“化地”到“化人”的治理阶段性转变。传统的城市空间治理遵循人口集中、产业聚集的“役物”逻辑。在资源有限、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度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物本逻辑带来的后发优势，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和实践意义。随着“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价值”^④ 城镇化

① 即在城市的建构过程中，不仅仅要追求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在空间生产、分配和消费中不断强化和实现正义诉求。（Barney Warf and Santa Arias, eds.,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2）

② 崔翔：《论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人民论坛》2014 年第 5 期。

③ 城市学家芒福德曾指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所以，城市立足于人、服从和服务人的设定即以人为本。（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 122 页）

④ 李克强：《推进城镇化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行政管理改革》2012 年第 11 期。

主题回归，人本逻辑对物本逻辑的引导规训，进而通过矫正空间秩序失控来实现空间治理的人本性回归。

其次，实现“城市经营”向“城市服务”的治理理念变迁。推进“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城市经营—城市服务”的系统转变。城市空间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转换，就是要实现城市发展的人本价值归位，从而为城市治理理念奠定人本的基础，创设一个具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的城市生存发展共同体。在中国语境下，构建回应公众需求、坚持以社会为导向的城市服务型政府，就在于透彻地坚持“人本政府”的理念，真切地尊重市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和第三方的机制来导入民众的智慧，持续保障和发展民众权益。

再次，实现“物本”的经济目标转向“人本”的生活目标。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依然是关键，但不是唯一诉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将城镇化的动力、目标和发展过程回归到人本身，将人的权利、人的发展能力、人的福利和幸福作为城镇化的核心，^① 将经济发展纳入服从和服务于人之发展的价值谱系。

城市空间治理由役物转向化人的主题变迁，需要明确以下两点认识：第一，城市空间治理人本逻辑不能违背物本逻辑。第二，城市空间发展的治理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内涵式、集约化、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是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新型的城市空间治理无疑给这一道路提供了实践载体与政策机会。

（二）空间再生产过程的空间治理路径

城市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城市空间的生产和重构的动态调适过程。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化进程必然强调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的城市化，亟需以“空间正义”的价值和原则来反思中国已经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下构建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体机制。

重构空间资本的社会责任。社会主义空间资本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其必然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要有序地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社会主义资本在生产、扩张、分配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其公平性与人本性，进而实现社会的福利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更多人所共享。资本在占有城市空间的过程中，大量占有、使用抑或是损害了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公共空间，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针对目前中国政府对资本受益者的社会责任相关制度安排比较滞后的现状，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安排：以法治方式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动力机制，在法制上激发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建设的内生动力；创新激励约束相容的企业社会责任管控服务机制，寻求

^① 任远：《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企业治理的“大责任”构建机制；优化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诚信管理系统。完善企业的诚信责任档案，完善企业的征信数据库，以社会信用机制引导企业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以依法行政提高政府治理城市空间的综合能力。公共性是政府的本质属性，是现代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与执政之基。政府在治理城市空间过程中担当公共性的身份角色，它既要为城市空间治理的公共性规塑提供有效的宏观制度供给与微观的政策创制，也要在规约城市公民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实现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有效增长。^①

以空间生态化转型实现空间资本逻辑的人本化转向。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最容易造成的后果就是忽视生态效益，造成城市空间生产的生态化、绿色化缺失，同时这也是资本逻辑过度侵蚀城市空间的直接结果。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首先要尊重自然，根据自然资源的约束力、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来厘清城市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其空间规划，在城市空间内部严格作好生产、生态、生活不同功能区的科学布局，使不同功能区之间在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协调发展，优势互补，实现集约式发展。因此，政府应该把生态环境指标纳入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囊括绿色生产、权利保护、生态和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型政府绩效模式，以规制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绿色匮乏与生态破坏的乱象。

（三）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结构、动力与机制

城市空间治理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过程的基础性制度，既是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治理共同体，还是一种治理单位。其本质关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均衡发展的空间增长、修复及其优化的协同共治过程。改革开放以降，与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实际进程相比，城市空间治理的结构、动力与机制还是略显被动、不到位甚至滞后，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格局和国际环境条件已经为构建从“经济增长”走向“公平正义”城市空间治理的结构创新、动力创新与机制创新释放了正能量、提供了新机遇。

结构创新实现城市空间治理的制度化。实现城市空间治理转型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公众的合作伙伴关系，清晰地厘定各方责任是其关键。其一，政府是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核心行动者。其资源禀赋、行动选择、治理能力、制度化水平显著影响着城市空间的治理绩效。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行政主导是中国推进城市化的基本模式，同样也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主要路径选择。其二，企业

^① 在迈克尔看来，重构公共空间是建构城市权利的时代焦点。他主张为了权利、为了正义的法律而斗争，就需要拒斥抽象空间的和谐，而要建构列斐伏尔所指称的“差异性空间”。(Don Mitchell,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2003, p. 29)

和非政府组织是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重要治理主体。市场机制是社会走向普遍富裕的选择，也是实现利益协调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①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竞争投标、行政指导等方式提供本应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项目，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其三，社会公众是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实然主体。城市空间本质上是公共空间，城市空间公共性的价值回归着重体现为每个老百姓在参与、支持和关注城市空间治理中，能够充分利用和享受到生产生活的空间环境。因此，社会公众参与空间治理的能力与质量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治理的整合力与绩效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城市空间治理结构制度化的有机互动中，实现“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重心位移和深度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作为公共权威组织系统的政府在理念上逐渐实现接纳和践行尊重社会发展规律、践行整体性治理思想、警惕经济发展主义复辟的发展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

动力创新构筑城市空间治理的复合化。由于经济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经济社会相对落后，以政府主导的动力方式推进城镇化在情理之中。但是，中国的城镇化作为一种演进和建构的互动过程，市场牵引是最有效率的动力。“市场促进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了城镇化的步伐，是农村城镇化最有效率的动力”。^② 中国城镇化作为一种自发过程，社会大众成为推动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主体性力量。政府主导、市场牵引、大众参与的协同合作构成城市空间治理的复合化动力创新体系。

机制创新落实城市空间治理的有序化。实现城市化的科学合理发展、构建有序的城市空间需要新的机制给予保障。城市化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实现现代性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社会风险不断加剧的过程，如何让城市发展的红利、社会改革的成果更大程度上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是促进城市空间正义与共享发展，建立共建共享的有序化的治理机制创新：包括经济空间的科技创新驱动机制、政治空间的多元化协同机制和社会层面的共建共享的机制构建。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的当代文化生态

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生态文化，增强城市文化活力，是城市空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发展与现代性之间的危机关系是一种结构性

① 曹沛霖：《政府与市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3—240页。

② 杨发祥、茹婧：《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协同策略》，《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危机，是一种发展不均衡性危机。一个良性发展的城市体系，离不开安全、繁荣、宗教三大系统的同时存在、有机均衡，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城市的问题、危机与衰落。^①一方面，城市是解决人类危机的一种自然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城市由于各种风险的聚集，也成为诸多文化危机生成的场域。^②人与城市之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互动，是人的主体性与城市的可能性以及文化的综合性有机互动的过程。人的主体性、城市的发展性以及文化的综合性在目前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得到很好的实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人的主体性生长；二是问题与危机的客观实在性。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教育的不断大众化和人的主体性在不断生长，人认识城市问题、确认城市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长。

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生态文化，激发城市空间治理的文化活力，阻断城市现代性的主体性迷失与文化危机，需要构建“人—城市—文化—自然”有机互动的文化生态发展理路。其一，人的主体性的公共性回归。人的主体性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个体主体性、个体理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个体的主体性的过度增长，主体的公共性正在被遗失。既往为了实现人主体的有限性、公共性而衍生出的伦理禁忌、宗教文化等方式，在“唯科技至上”的理念支配下逐渐有所失效，为此需要重建“城市中国”格局下的城市伦理。其二，重塑城市的公共性。本质上讲，城市是自然演进和人为建设的复杂结果，是“生成”与“做成”的结合体。城市发展的合规律性与主体创造性有着内在的结合规律和生长发展方式。但是，如若城市的功能被异化为经济增长、物质创造的工具，会导致城市与人关系的紧张，使人的主体性在城市空间内得不到心灵归属、文化认同、情感调适，城市便会演变成为对人们而言“异己”的“钢筋水泥森林”。以此观之，构建开放包容城市文化生态是克服城市现代性文化危机的重要选择。其三，文化本性的公共性回归。现代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公共性逐渐被资本的逐利性所取代，文化不再是公共的、神圣的事务，而变成了资本、工业和科技的附庸。重塑对文化的敬畏感、神圣感，使城市文化回归公共性是构建城市开放包容的生态空间的必需选择。其四，自然的公共性再构。自然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但却不断遭受资本和权力的肆虐而沦为逐求利益、维护秩序的工具。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修复自然的机会和可能依然存在。正如吉登斯所言：“一个总体性的关怀全球的体系可

①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3页。

② 譬如，列斐伏尔就指出，非城市空间的介入，会使数量庞大的社会规则与彼此无关的文化碎片渗透到城市空间当中。城市空间中的文化并非同质的，而是多种亚文化的互相激荡、融合和渗透。（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 114）

能被创造出来，它的目标将是把世界的生态健康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① 简而言之，重塑自然与生态的公共性，尊重自然规律是化解社会文化危机、构建开放包容的生态文化、激发城市空间的活力的必要选择。其五，依托现代信息与技术，创造城市空间的“智慧治理”。信息与技术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再不是一个单一的有机组织，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治理社会。^② 这催生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网络城市”、“虚拟城市”等。在信息时代，需要在尊重人们信息自由共享的基础上尊重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实现信息共享空间的安全性治理。

结语：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治理的中国智慧

以“空间治理创新”治愈中国城市风险化问题，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学界、政界、商界的高度关注和跟踪研究，彰显其自身的世界意义，是因为它蕴含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and 实际进程，为参与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治理积蓄了富含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智慧。在全球城市治理体系亟待空间转向之际，中国究竟能够贡献怎样的智慧？笔者认为应当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中寻找答案。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更在发展的动力、方式、方向、目的上，为全球化时代破解城市空间治理难题、增强城市空间发展动力、厚植城市空间发展优势贡献了中国智慧。

以创新发展理念解决城市空间治理的革命性问题。较之于西方狭隘的技术创新即“企业家创新”的主流理论，置于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创新发展新理念，奠定了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人民主体地位和解放社会活力的价值基础。人民主体身份和社会活力释放的双重创新价值的凸显和提升是对城市空间治理动力的革命性突破。

以协调发展理念解决城市空间治理的系统性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时代，如何在强调主体个体发展的同时，注重不同主体、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由利益关系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短板之间共赢合作，这是一个关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矛盾运动过程。协调发展理念旨在系统性地应策中国城市风险化空间治理过程中上述矛盾运动规律。

以绿色发展理念解决城市空间治理的永续性问题。在致力于发展经济、获取财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② 林尚立：《重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对话》，《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富的城市化运动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被摆在了拥有“一票否决”的发展位置。以破解资源和生态约束发展问题为导向，促使生态文明政治实现的绿色发展新理念，从人与自然、人与城市、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中，反思城市化发展的永续性问题，反映出中国对城市化发展质量规律的理性认识和智慧反思。

以开放发展理念解决城市空间治理的联动性问题。主动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化大势，积极利用全球化科学技术和治理方法的开放发展新理念，既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更是中国从低层次技术引进式开放到互利共赢的高层次联动式开放的创新。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标志性工程的开放理念，其核心要点就在于在世界联动发展中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为世界提供具有中华文化优质特色的“世界性公共产品”。

以共享发展理念解决城市空间治理的公平性问题。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添经济发展动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诉求谱系中，公平正义问题构成共享发展理念解决的基本问题。“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议、共建、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构成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科学性、公平性及其可持续性的价值愿景。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趋势下，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关口，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五大发展理念，在为减缓中国城市风险化压力储存更持久、雄浑的内在动力，以引领中国城市化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城市空间治理的合作共赢贡献了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李潇潇〕

values,” and pursue and shape the new spiritual faith and (rational) faith in values in national culture. This process of pursuit and practice emphatically indicates the course of autonomous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new shape of this culture,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entire realm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 fulfills and evaluates itself. In a deeper sense, “Chinese values” clearly indicates the orientation toward practice, follows the logic of the real fulfillment of social “public values”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al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commonality and of 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call of a sublime faith in justice, and the promise of the reality of a universal good life for today’s Chinese people. “Chinese values” sets up an emphatic image of “the Chinese” as having the bearing and generous hearts of contemporary “citizens of the world,” the great features of benevolence,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and the ethos of self-respect, self-confidence, self-strengthening and independence.

(3) Urban Risk Orientation in China: Space and Governance *Chen Jinhua* • 43 •

As an issue in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risk orientation reflects and invites reflection on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immediate or potential risks entailed in rapid urbanization across the globe. China ha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risk as part of research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 scrutiny of spatial theory indicates that urban risk orientation in China is essentially a structural issue arising from an immature system of generalized preferences in urban space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an unbalanced spatial structure, functional disorder and ecological disruption arising from inequitable and unbalanced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readjustment and renovation. As an innovative form of modern urban public management ranging from utilities to human resources, spatial management enlists play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ociety and citizens to seek a “community of spatial interests” with a rational structure, effective functions and an optimized environment at the level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This would carry out innovation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s, drivers and mechanisms of urban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associated cultural ecology with a view to realiz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synthesis and reordering of urban spatial management, strategically forestalling and resolving the risks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spatial governance vision of scientific, fair and sustainable allocation, growth and renovation

of urban space in the age of risk.

(4) Build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Vault over the Middle Income Trap

Gong Gang, Wei Xiye, Yang Xianming et al. • 61 •

Some doubts have been expressed over the existence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On the basis of a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and the uniform growth theory interpretation, we clarify the queries about its existence, using a growth theory framework to research the causes, mechanis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whether a developing country can escape the middle income trap depends upon whether the technological growth rate it achieves through independent R&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rontier count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are laying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that will enable the country to vault over the middle income trap.

(5) Correlation of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Economy: Empirical Research at the Level of Scale and Periodicity

Su Zhi, Fang Tong and Yin Libo • 87 •

The virtual economy's divergence from the real economy has become a classic fea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and China is no excep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GVAR model and 1992-2016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data of major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we conducted research focused on tes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economy in China in terms of scale and periodic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ur findings show that both scale and cyclical fluctuations demonstrate the increasing divergence of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economy. At the level of scale, the virtual economy is unresponsive to the real economy's reaction to shocks but is more sensitive to shocks to itself, and has a "crowding out effect" on the real economy. At the level of cyclical fluctuations, the real economy just has a short-term pilot effect on the virtual economy. A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test further confirms the fact of divergenc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pricing and monetary policy can suppress the tendency for the virtual economy to diverge from the real economy. Our analyses provide detailed

• 205 •